

我記憶中的空軍子弟學校

笕橋·成都·南京·台北

(彩色圖照刊第六頁)

●吳君植 (空軍烈士之女、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籌建委員)

二〇〇三年美加空軍子弟學校校友會聯歡晚會的後一個星期日，朱力揚學弟來電話問我，能不能將記憶中台北空軍子弟學校的平面圖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寫下來。十分高興能有機會敘述「我與子小」，可是我的中文底子本來就不好，加上來美國後四十多年，一直沒有機會用中文，常常想一個字還得從中英字典中由英文找中文，說來真可笑。

恕我「充殼子」，我相信空軍子弟學校校友中絕無第二人比我與子弟學校關係更親切。一般講來每個人進入小學，從幼稚園開始，到六年級畢

業頂多七年就結束了小學生涯，步入中學，以後就跟空小沒有來往了。我的故事是這樣的：

笕橋時期

家父吳紀權航校四期，畢業後留校做飛行教官，母親帶著妹妹跟我不老家安徽搬到杭州，住在「醒村」，我就進了陳校長（鴻韜）新辦的航空委員會子弟學校幼稚園，我記憶裡，家父騎著自行車，我踏上小三輪車，每天由醒村到學校，我的家在醒村丙區第一排，前面是一片菜園，交通安全，所以常常放單飛，獨自騎上小三

輪往學校跑，小時喜歡盪鞦韆，小三輪靠在鞦韆架子旁，玩夠了，回家，學校給我的印象，那是個好玩的地方，這樣家父跟陳校長變成了朋友。

「七七」事變發生後，很快的就結束了我在笕橋的學生日子，父親將我們送回老家，自己立刻回航校，暫編入臨時卅二隊，基本少尉隊員。「八一三」滬戰發生，日機連日空襲上海、南京、杭州一帶空軍基地。「八一六」拂曉，日機六架偷襲第三十二隊基地嘉興，家父與黃保珊（三期）駕道格拉斯 O2M 一一八機，在嘉興上空與敵機空戰，由於飛機性能不如

敵機，中彈，機毀人亡。

離開杭州後再見到陳校長，那是在漢口，家母帶著我們（妹妹及祖母）逃難到後方，當時航校副校長蔣堅忍先生（是航校六期畢業生，家父帶飛的學生，蔣氏由陸軍轉到空軍。為領導統率而學習飛行）不放心家母孤家寡人拖老帶小的去領撫卹金，特地請陳校長陪同領取，這也是以後母親任教空軍子弟學校的開始。

成都時期

抗戰的初期我們住在四川江津，有一天我記得母親跟朋友商量，是不是該搬到成都去，因為陳校長來信說：「航空委員會在成都建造了『空軍烈士遺族新村』，如果搬去，將來政府也會多給我們一些照顧。」就這樣我們搬到成都東門外龔門舖「空軍烈士遺族新村」，後來改稱「空軍榮譽新村」。空軍子弟學校在榮譽新村的當中，校舍是三合土的地，茅草蓋的

頂，形如飛機，兩翅膀是教室和辦公室，機肚為大禮堂，大門是三個弧形的門，一進門，一邊是佈告牌，一邊是學生壁報，陳校長的黃包車在佈告牌的後面。

基本上學生大都是「榮譽新村」無父的一群孩子們，校區有宿舍，所以也有很多從城裡來的空軍子弟（躲警報）加上附近士紳的孩子們，及四行新村（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農民銀行）送來的學生們，這就是當時龔門舖空軍子弟學校學生背景。空軍子弟學校在成都時有總校在沙河堡，一分校在城裡五世同堂街，二分校在龔門舖鄉下，後來因為這群無父的孩子們各方面表現得比其他兩校好，加上陳校長全家也搬到村子裡，龔門舖空軍子弟學校改為總校，沙河堡變成二分校，三校相隔很遠，但常常有活動在一起，如各項比賽，運動會……等，記得二分校林振基運動優秀。勝利後為南京市田徑隊選

手，參加民國卅七年在上海舉行的還都後第一屆全國運動會跳遠得分。

每年三校競爭的最高潮是六年級畢業會考，三校畢業生通通集中在龔門舖，作為期兩天的畢業考試，因為龔門舖在鄉下，不怕警報，外加有宿舍，到時緊張，熱鬧非凡，考完後，名單依成績先後公佈在佈告牌上，一九四四年（民三十三年）我們第四屆畢業生六十二名，前十名中，八名都是總校學生（只有第五、第七是分校學生）總校師生好不開心。

龔門舖的老師們

一九四二年（民卅一年）我進總校時已是五年級學生，級任導師潘繼泗（空軍張保衡烈士的太太）當時她的兒子張武林也該進五年級，但是潘老師怕別人講她偏心兒子多拿分數，特別將張武林降放四年級，張武林的確是高材生，從小就考第一，以後中學、大學（台大電機系）都拿第一。

彭延珍老師是我到遺族新村，第一眼就認出我是誰（早年，彭延珍老師與家父中學同學，當時低班女生是多麼崇拜能考入航校的高班男生），當我們第一次在村子裡遇見時（小時我長得很像父親）她第一句話：「你姓吳，安徽人，父親是不是吳紀權？」

「當我給她肯定的答覆後，她一把將我摟在她懷裡，知道她已失去了當年心中崇拜的英雄。後來彭老師教過我地理、算術、音樂，哪門課缺老師，她就去教，我一直很佩服她，她的兒子周一夫、周一怒也都在子小，但是我比我小多了。」

教務主任阮卓，很正直很兇，學生都怕他，他認為這群無父親的孩子們，不好好管教那還了得。

六年級級任導師胡重琪是到到地的四川人，他把我們班上十六個學生，個個送進了中學。

董月琴女老師教體育及童子軍，對付我們班上高大調皮的男生，實在

不是一件易事。

范天一是一是甘肅來的，教音樂，不折不扣的共產黨黨員，除掉抗日歌曲外，其他的歌都是以後共產黨的流行歌曲，他跟張子銳、彭連芳，還都到南京子弟學校，等共產黨入南京時，他們都是得獎的忠貞幹部。

朱馨士老師是舍監，管住校生，責任重大，學生都是小不點，三餐、穿換衣服、清理宿舍，樣樣都得想到。講起朱老師，就連想到她的兒子史光中，他跟我同班，史光中為了考進國立川大附中挨了兩頓打，首先我們一道去看榜，因為人多心慌，他沒有看到自己名字，回來被朱老師訓打一頓，週末史光中父親史岩，大學考古系教授，回家路上順便再去川大附中看榜，發現兒子名字在榜上，老爸覺得兒子不中用，榜上有名都看不到，多差勁，又挨了老子一頓。

王樹剛、閔一塵夫婦都是總校老師，閔老師教美術勞作，兒子王子偉

、王子奇都是小時玩伴。

吳本衡是中年級級任導師，丈夫是軍醫。

宛茂茵老師是千里尋夫，落腳到子小，她在家鄉訂了婚，未婚夫從軍隨部隊到了成都，等他們在成都重遇，戰爭都快結束了。

趙利國是總務主任，母親任職出納（管錢的），范立珍是會計，算盤打得奇快，像放連炮，每學期開學時，他們可忙得很，因為學費可以以米貸金（一大袋一大袋的米），非空軍子弟學費多一點，我們這群遺族子弟是全免。因為學校有住校生，所以月初得交伙食費，每年開學，他們都忙得不得了，光是數數當年變值很快的鈔票，就是很花時間的事。

其他老師，因為沒有直接教過我，只記得一些名字而已。

陳光明是忠心為校的事務員，附近跑腿採買，三校間的傳遞公文都靠他，學校供他一輛「洋馬」，他就自

由自在騎著到處跑，那時我身材瘦小，常搭便車（坐在前橫桿上或後架上）上坡，踏不動時，我就下來跟他走一段，下坡太快時，我雙眼一閉，死活聽天，當時有「洋馬」的人可神氣，比起一輪的「雞公車」要快多了。

每天的生活

升旗是一天的開始，記得台灣中小學唱的升旗歌嗎？「山川壯麗，物產豐隆……」，抗戰時我們唱的升旗歌是：「看國旗在天空，飄飄盪盪乘長風，顏色麗、氣度宏，青天白日滿地紅……」，接著是校長老師訓話，早操後，散會進教室。我喜歡降旗放學集會，那是高年級學生最威風的時候，因為童子軍要服務人群，護送小朋友回家，一路上，一百呎佈一崗……最後的一位童子軍在小山坡上，幾乎半哩以外，大家以服務為榮。

課外活動

抗日時期，生活艱苦，沒有收音機……也沒有玩具，我們的娛樂都是自創的。白天，踢毽子、拍皮球、官兵捉強盜……附近水稻田捉螞蚱……

總校失火

等。天黑後，我們最喜歡的「貓」捉「耗子」，當時我們的龍頭是校長大公子陳謨星（以前叫陳拱北），只要他一聲呼喚，馬上可召集十來個玩伴，其中有張武林、劉燕姁……比較年齡大一點，遊戲是這樣開始：當「貓」的數一、二、三……到五十就可以開始來捉「耗子」們，當「耗子」的小心圍著整個的校舍四週躲避……結束這遊戲的方式有這幾種：①大家同意一道散會回家。②有時當貓的人被「整冤枉」張武林常常被「整」，當他在數一、二、三……的時候，龍頭示意大家各自回家，弄得當「貓」的還在一本正經的在找耗子。③有時當「貓」的自作聰明，數完五十就偷偷的回了家，讓做耗子的還在圍著校舍團團轉。想想當年的玩伴，現在都是有成就的 M.D. & Ph.D.。

民卅五年三月九日覺門舖總校大火，將整個的校舍燒得光光的，那時我已任初中二年級，住校城裡。當星期六回家時覺得事情不對，因為平時走到離家半哩的小山坡上，可以看見學校的房頂，這天房頂沒有了，等我跑回家，學校燒掉了還有餘煙，家裡母親聲音嘶啞，講不出話來。

當時母親的職務是出納（管錢的）火警是她第一個發現的，當她開門出去狂叫「救火」……別人以為土匪強盜綁票，捉住了母親在燒她……反而將門窗關緊一點……，等她破窗進總務處，將帳本鈔票搶出來，再想回去第二趟時，已不能進去了。這件事發生時，還有另一插曲，我不知該不該提一提，反正現在時過境遷，母親已經去世，當事人可能也不在世，無人證物證，但我一直記得母親告訴我

：「火」是人放的。

母親發現那晚火警是這樣的：我

們房子是新村丙區頭一排第三棟，離學校只有幾十呎，她從睡夢中聽到外面有人乾咳，當她推開窗子看到學校房頂上有點點火苗，等她開門出去看見外面一男士嘴裡叼著香煙，對母親露出怪怪的笑，當母親大叫「救火、失火了……」，他完全無一點幫忙之意，還反說：「你不要命啦，有什麼好救的？」母親沒有看見他放火，無物證，只好順水推舟，大家都說電線走火，就是電線走火，此君我不記得他名字，到還記得他住在李××老師（名字在此不提）家，是一位空軍官級較高的姻親，平日不務正業，抽大煙，經常向學校借錢，後來校長不借錢給他……總之，在母親心裡，他就是放火者。五十七年後，我與一位成都時期的老校友同去拜訪陳校長，當我提起成都總校失火事件時，老校長很生氣的說「那個×××，臨走還放我

一把火」這也證實了母親的話「火是人放的」。

還都南京

吉裳老師一家，彭延珍老師一家，楊霜泉老師……等加上我們徐守葑老師……：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三、四十人，統統擠居一堂，真是熱鬧。

一九四六年（民三十五年）五月

南京時期

十四日，在成都少城公園舉行了臨別的聯歡會，三校都有人參加，六屆以上的畢業生都在中學裡讀書未能參加這次的聚會，緊接著大家紛紛往東返鄉（「腳底下的人」或「下江人」都向上海、南京一帶回返）空軍子弟學校教職員分兩批——一批是隨陳校長七、八十人由隴海路向東行，我們早一批的隨三路司令部派來的五十輛十輪大卡（包括榮譽新村眷屬，及一些子弟學校教職員），浩浩蕩蕩兩天工夫到了重慶，在重慶等飛機或輪船再繼續東行。

空軍子弟學校在南京復校時，先是在牙巷，再搬到八府塘，前後只有兩年半的時間，幾乎每學期都在增班，學校竟成南京市的模範學校，非空軍子弟，設法找「關係」進入空小。我已不是小學學生（妹妹君培時在五年級），我已是中學住校生，週末才回家，「家」就是空軍子弟學校。當時有夫、有妻的老師，都住在校外，單身、光桿老師住在學校，母親算是單身（妹妹跟我是她的附屬品）住在學校裡。我當時住的問題——有床位

重慶住的問題：兩路口，空軍新生社，無法容納這麼多的過路客，最後將子弟學校老師及眷屬統統安排在最底下一層的會議室裡，我記得有朱

的時候，我睡在單人床上，擠的時候，我睡在雙人床的上舖。當宿舍都滿時，我就睡教室。妹妹小一點，總是跟在母親身邊，同床或同室。我就成

有床位的時候，我睡在單人床上，擠的時候，我睡在雙人床的上舖。當宿舍都滿時，我就睡教室。妹妹小一點，總是跟在母親身邊，同床或同室。我就成

了游擊隊隊員，校長讓我到處流動，哪個單身女老師房裡有空，我就帶被帶枕頭到那裡去，這樣我結交了好榜樣的女老師，母親的同事，我的大朋友。

彭延瑜老師（彭延珍的妹妹）幼稚園代課老師，比我只大幾歲，是我的玩伴，常常抽空一道去看電影。

張伍鳳老師的潔癖，每早一起床，衣服不先穿，先將被單的兩頭抓住，死命的抖幾下，有一學期我睡在她旁邊的單人床，清早給她這一抖，只好起床。後來她也去了台灣，與一位軍醫結了婚，離開了子弟學校。

施慶雲老師跟母親同房，我認為她是最漂亮最端莊的一位，對我跟妹妹都特別照顧。

趙靜如老師講一口廣播電台的標準國語，那時她正在與一位廿八期的小空軍交往，十四、五歲的我，覺得那是多麼神秘、可愛的一回事，她誠懇的把我當個「娃娃」，教我如何讀

書、做人、交友……等，直到我大學畢業後，在台灣中部教書，還把她的家當做我異鄉之家。

在南京短短的兩年半的時間，我看到校長勤勞的帶著工人作清潔，與工人一道填八府塘，增加學生活動場所，冬天拿著大掃把掃雪，過年圍爐吃火鍋，除夕帶著無家的教職員賭錢，先發紅包娃娃們才有賭本。子小此時真是飛黃騰達，好像每學期都在增班，加添新教室，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學生的活動也擴張到校外。我記得週末，陳福民、吳君培、申靜，時常被空軍廣播電台請去客串「空軍之歌」、「西子姑娘」……等，每次他們去電台，我們就留守在學校收音機旁，等聽他們的歌聲。我那時的角色，不是子弟學校學生，又不是員工，但任何活動我都插一腳，校長總會找點事要我做。

三十七年底（一九四八）兩黨和談破裂，南京市中學生第二次月考後

，學校就結束了，空軍子弟學校也在十二月一日正式停課。那時人心惶惶，不知哪裡去才對，父親同學把我們接到上海，一個月後，陳校長來信說，子弟學校奉命遷往台灣，由南京下關上船，我們又從上海乘火車到南京，乘一月八日由下關直開基隆的「中興貨輪」，子弟學校教職員及家眷，統統分配在船的底艙，船行三日，我連黃膽都吐出來了，發誓今生再不坐船。船抵基隆，在上岸前大家先脫掉棉襖棉褲。從兜生意的小船上買了一掛香蕉……總算我們到達了嚮往的寶島——台灣。

同船來的有廿多個不同單位，子弟學校奉命第一批下船，其餘留宿過夜第二天再說，七十多個老老小小的教職員及家眷，先後上了岸，剩下年輕力壯的來搬行李，上船容易，下船難，好像在限定的時間內，所有行李都得上岸，但底層到上層只有一個狹小的樓梯，胖大一點只能一人行，無

法拿行李。那時我雖瘦子，氣力蠻大，我以七十度角度躺在樓梯上將行李由腳下（有人幫忙）舉到頭上，交給上一層接手的人……不管行李大小，每件行李都要經過我這一關。當時有兩件行李其重無比，連罵「格老子的……」把它們舉上去，原來是丁碧雲老師帶的兩袋米，怕到台灣餓死，後來我們是朋友，但這輩子都記得那兩袋米。

台北時期

船到基隆，當晚我們乘車抵達台北新生南路空軍指揮部新生社，那裡是空軍官兵們暫時留宿的地方，哪裡有地方接待由船上來的，像難民一樣的子小教職員及眷屬，好在我們的家長——陳校長交涉，把我們統統安頓在他們大汽車房裡。

未有多久，這批教職員統統隨校長去了虎尾，虎尾是當時各地遷來的空軍眷屬集中地，復校的第一地點。

留守在台北空軍指揮部新生社汽車房的，只剩下兩位住台北辦事的文書——羅慶餘老師及後來做教務主任的楊留曾老師、一位燒飯工友老萬（？）另外就是我們幾個重要人物。在台北上中學的子小校友包括校長的兒子陳謨星、陳福民，大陳老師（陳岳如）的女兒陳澹，許汝珍老師的兒子一平，徐守葑的女兒（我）吳君植、吳君培，外加劉昌琨、昌樸兄弟，五男三女。校長讓工友將南京帶來的黑板釘起來，隔成一間無底無頂小房間，讓我們十幾歲女娃娃住，男生仍舊住統倉，在我們的旁邊，除掉上學時各奔東西，回來後又是擠在一堂，到是蠻開心的。

陳校長虎尾——台北來回奔走，

後來駐台北監工修建仁愛路三段新校舍，好像是五月中，我們統統離開了空軍指揮部新生社，搬到嶄新的空軍子弟學校。

因住新生社汽車房的同學們，各

自回到眷區（新村），我跟君培也回到我們的「家」——空軍子弟學校。母親跟另一位老師分到在教室旁邊的一間小房間，三張小床、二位老師、三個中學娃娃，台北中學無住校生，所以那時，我只好等大家就寢後，拿著被睡教室。後來學校擴大，新來了許多單身女老師，這一來校長乾脆將一間房間統統舖上「榻榻米」，橫直可以睡好些人。我跟另外兩位上一女中的曾伯鴻、陳澹加入了老師的陣容，解決了宿的問題，大家對我都很好，我是徐老師的女兒，工友們叫我「吳大小姐」或「大姑娘」。我不是他們的教職員，但是我總是屬於子小的。

幾件有趣的事

記得當年的廁所是男女同一門進去，男生在右邊，女生在左邊，每間門上外面有一個門門，裡面有兩個門門，用的時候，裡面將兩個門門關上，外面就打不開了。當我們搬到新校

舍不久，女老師發現一件怪事，當晚間就寢前去用廁所時，有位神經不正常的男仕，會一絲不掛的躲在廁所裡，故意將第二門門不關上，等你開門要進去時，會跟他對面相撞，嚇得女

老師們大聲呼叫往外跑，為了要捉此君，我曾與幾位男老師商量，要他們做後援。如果有一天，我碰到這「傢伙」的話，不久此君運氣不佳，有天空當我去廁所時，我先敲門，無應聲，將門開一半覺得裡面有人影，我速急將門關上，用背抵門，用腳頂住牆，大叫高老師（高忠延），當我的援兵來時，此君衣服還未穿好……除去這一害，給女老師不少安全感。

克難成果

新校舍，院子裡荒荒的，好像少掉了什麼。有一天，校長朝會上發起每家一瓶——每個學生帶一個媽媽燒完茶要扔掉的醬油瓶醋瓶或酒瓶……洗乾淨，小心帶到學校交給級任導師

，消息傳出去，一星期後收集了上百的瓶子，校長別有心裁的將瓶子倒立著，依次一排排的埋在土裡，地面上露出三吋，頓時校園就變成美麗的花圃。

復校後第一屆校慶

台北復校的第二年，學校有個大規模的校慶，每個教室有著不同的佈置，壁報、成績展覽，總之每個角落煥然一新，台北市、政界、教育界、新聞界都有人來訪，美不勝收，聯歡晚會借空軍司令部新生廳舉行，節目精彩，一連兩個晚上，麥閣明老師主辦晚會，放學回來我也幫忙，排演、練習。

記得我還教了一個八人跳的古裝舞，麥老師教的「疊羅漢」、「啞子背瘋」……等，反正那兩晚學生家長們都瘋狂了，整整三天的慶祝，凡是來參觀的人，莫不都伸出大拇指「硬是要得」。

「幼鷹」報捷

民國四十年代，是台灣籃球比賽的極盛時期，國隊有「七虎」、「大鵬」、「鐵路」，女隊有「碧濤」、「純德」、「良友」，為慶祝「二三」自由日，台灣首次辦了「自由杯」籃球比賽，分成人組及少年組，少年組的球隊是來自全省縣市中學籃球隊，總共有一百多隊參加這次比賽。

空軍子弟學校校友數人（陶至真、馬玉章、揭天和、周裕彪、李祖原……等），平日在空總籃球場「鬥牛」為戲，決定組隊報名參加，球隊可無領隊，但少不掉教練，當時劉燕姁和我正是師大四年級學生，而都在師大籃球隊，燕姁更是國手，是「良友」隊的主將，很榮幸被學弟們邀請做他們的教練，我們倆現炒現賣（現學現教），把我自己師大教練朱裕厚老師教的幾招，立刻排上用場，轉教我們的校友隊，身為空軍子弟，父親輩

是生龍活虎的飛將軍，成人組有「大鵬」（空軍隊），所以我們決定隊名叫「幼鷹」。

解決隊員制服問題，「幼鷹」不是學校代表隊，無經費制裝，也沒有有錢人士撐腰，只好用塑膠紙剪好「幼鷹」兩字及號碼，縫在白襯衣上，褲子是家家有黃卡基短褲，每場球賽完畢，將字及號碼拆下來，衣服洗乾淨後再縫上去。最初幾場比賽，其他球員看看我們的克難制服及兩個女教練，一點不把我們看在眼里，直到我們連贏了幾場球後，這才引起了球界人士的注意。

第一屆自由盃少年組的比賽結果，文山中學第一，新竹中學第二，「幼鷹」第三，好出風頭。我相信這些校友們，今生都會記得這次的光榮紀錄。

台北第一次空小校友會

台北復校的頭幾年，畢業生幾乎

百分之百的考入初中，九十%以上都進了當時有名的省中、附中、建中、成功、一女中、二女中……等，非空軍子弟只要找到關係，都設法將孩子們送到空軍子弟學校來。

有一次，早期畢業的同學與校長閒談中，覺得我空軍子弟離開小學後各自分散，我們互相關聯有個聯繫、有個組織，當時早期在成都畢業的校友都在大專學校裡，大家就自告奮勇籌備校友會。

第一屆校友會是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在台北空軍子弟學校舉行，出席的人不多，只有二十多位，主要是消息傳遞不夠，全靠口信通知，但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們，蠻高興的渡過一個下午。

記憶中的老師們（五〇年代）

空小老師是母親同事，但很多從北師、女師畢業出來的小老師們，跟我年齡相仿，就成了我的朋友。

我敬佩高年級（五、六）的單身男老師，他們幾乎將全部的時間和精力，統統都給了他們的學生，除掉白天上課，晚飯後附近正義新村、正義東村的學生們又都回到教室，做他們的家庭作業，老師彼此之間也在競爭，希望自己班上學生個個考進省中。

中年級（三、四）及低年級（一、二）女老師比較多，雖然晚上沒有學生回到他教室，但每天抱回家回宿舍的學生作業本子就是厚厚的一大堆，如今我還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姓名（別號）及他們當初的容貌……他們交友、談戀愛、結婚……等，母親收集了很多他們的訂婚照、結婚照，母親去世後，這些像片就留在我這裡了。

母親比他們年長，跟每個老師都合得來，他們稱母親「老大姐」，常常就變成了他們私下日常生活的顧問，交朋友、生娃娃，什麼樣的事都有，我沒有專心聽他們之間的談話，但好像事事都進入我的耳朵。

特權女老師

黃拙愚老師是四川人，丈夫是陸軍為國捐軀，獨養兒子，空軍幼校畢業進入空軍官校，未學成也摔死了，留下這位孤家寡人的「黃老太」，開頭在子弟學校教書，後來不知為什麼離開子弟學校。但始終佔有一間寢室，說什麼也不搬，她橫不講理，但也有番道理。她有時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講「格老子、龜兒子，打什麼仗？我丈夫是為國家死的，兒子雖未打仗而死，也是從小投筆從戎，準備為國獻身，如今留下我孤家寡人，陸軍不管我、空軍也不管我，不講理，大家不講理要賴，我也不搬，我已無處可搬。」校長同情她可憐，也沒有趕她出去，就讓她保留那間小房間。

平時她經常不在家，怕小偷偷了她的東西，又怕不在時被抄了家，所以重要、貴重的東西統統交給母親保管，也只聽母親的話。那時「黃老太

」才不過六十出頭，她常去東門町游泳池學游泳，跟什麼人學按摩。當時覺得五十歲已是老人，人老了就該規矩矩登在家裡。現在想想，我們六十五歲才可退休，七十歲才學 Line-dance、打拳……等，其實那時的「黃老太」，才是真正的前進份子。

無報酬的保姆

台北復校後，生活安定下來，女老師們結婚、成家、生娃娃接一連三好多小娃出世，譬如蔣佑真的方小惠、方克難，羅肇祿的羅小毛，司機楊燕生的楊小弟，丁碧雲的小哈哈，那時台灣沒有保姆（Baby Sitter），就是有這項職業，做老師的也請不起，他們白天怎樣照顧這些小娃娃，我不記得，但我記得每天一放學（二女中

）回家，立刻就成了他們的 Baby Sitter（天生喜歡小娃娃），所以幫他洗澡、餵稀飯、換尿片，樣樣都來，這就連想起到美國後幫好幾位同學「做

日子」，她們驚訝的問我，怎麼知道那麼多，現在回頭想想，那全是在空軍子弟學校時做過「實習生」。

結束了空小為家的日子

一九五八年（民四十七年）考取大專留學考試，經過一番出國前的磨練……特別陳校長為我多方設法籌備路費……今天我能在美國讀書、教書、退休，我將會終身記得這全是歷年來積下的教育薰陶，及陳校長不斷的培養與輔導，自那年我離開台灣後，我就離開了「家」——空軍子弟學校，已經四十五年了，直到洛城校友會，讓我重溫舊日的一切，如果不是這篇日記，恐怕再過幾年，我會都不記得了。

編者按：作者吳君植女士為空軍烈士

吳紀權長女，一九三七年八一四空戰後之第三天，其父為國捐軀，時作者年僅四歲。本文是她成長的故事。